



## 後記

我的妻子秦吉瑪是博古的小女兒，但我們結婚幾十年很少談論她父親。她出生在莫斯科，1950年才回國，從未見過父親，她對父親的瞭解僅限於黨史課中講述的「博古犯左傾教條主義錯誤」。2001年，吉瑪的堂哥秦福銓（叔叔楊琳的大兒子）拿來他自己寫的書《往事記憶》手稿四大本，讓我們看看，給他提提意見。

福銓的《往事記憶》記述了多年來他從他父親、潘漢年、嚴樸（嚴慰冰的父親）等聽來的「故事」。很多事是我們過去聞所未聞，其中不少是涉及中共高層的「一手」資料，極具史料價值。吉瑪的哥哥、姐姐看了也都認為這是一本好書，對研究中共黨史很有參考意義。大家鼓勵福銓進一步完善，爭取公開出版，為歷史保存一份珍貴的資料。

鑒於福銓、大哥、大姐年歲都大了，精力有限，作為家庭中最年輕的成員吉瑪和我「毛遂自薦」，願意協助大堂哥整理文稿。

福銓多年在新疆工作，我們雖是親戚，在此之前卻很少來往。自從我們開始一起整理文稿，彼

此才有瞭解。福銓是秦家年齡最大的孩子。博古去世很早（1946年39歲即去世），他的孩子那時還小，因此知道他的事很少。解放初期，福銓已是20歲的人，長期跟隨叔叔楊琳認識不少黨內外高層人士，自然有條件知道很多事。福銓又是一個有心人，對父輩的歷史很有興趣，特別是當他看到公開的報刊、書本、黨史講有關伯父博古的歷史和他自己聽來的「故事」不一樣時，更激起他的好奇，促使他有意識地收集、記錄下這些聽來的故事。文化大革命後環境寬鬆了，等他退休了，才有時間完成自己的心願。他花了大量的時間，去查閱、考證，把這些辛苦積累下來的「故事」聯繫起來，寫出了這本回憶與研究性質的《往事記憶》。

這份手稿的內容來源有二：

一、福銓多年來收集記錄的他從長輩們聽來的「故事」，這些「故事」涉及面很廣，有的相當完整，有的支離破碎。這些從當事人聽來的故事並不是當時的採訪、記錄，有的還聽多個人講過，都是作者事後回憶整理的。除了重要的故事外，每件事，每句話何時何人所講，他無法明確做出說明。

二、為了把這些故事寫出來，讓別人看懂，必須補充一些資料、背景、時間、地點，為此，福銓做了大量研究工作，參考採用了許多公開的資料。然而，福銓到底不是黨史研究者，他把參考來的內容融入自己的文章，但沒有記錄引用的資料出處。要想再補上這一工作，給出註釋，量太大，他已無精力去做。

這樣一份存在先天不足的手稿，作者又是博古的親屬，如何使它儘量真實可信，避免「為親者諱」，使它確有參考價值，我和福銓商量了幾條辦法：

1. 文稿最大量最寶貴的是那些直接從楊琳、潘漢年、嚴樸聽來的「故事」，由福銓負責忠實地記述，不加水份。並在〈前言〉裡盡可能說明來源。

2. 為了客觀、公正，正文中只講述事件過程，不加作者個人的猜想、分析、評論，不加帶有作者情緒的用詞。力求加強正文的史料性，供後來的研究者參考利用。

3. 每章加一段引言，將原稿中作者自己的分析、評論集中到引言，以免讀者誤會是當事人的講述，也表達作者的一些觀點

4. 書中採用了大量精確到「日」的時間，很多是作者的考證，據他說有的是他推算的。史學界對事件發生的時間經常存有爭議，如果沒有必要，不要寫的太死，可能的話改用「月初」、「下旬」等寬泛的用詞。

5. 提到「博古」的地方，原稿都用「伯父」，現都改用「博古」。

文稿就是這樣由我整理，吉瑪錄入，交福銓審定。最先整理出〈遵義會議前後〉一章，其中周恩來和博古一次重要談話，原稿是以兩人對話的形式展開的，福銓改用他當初筆記的形式重寫這一節，這樣更接近潘漢年的講述，更準確地傳達當事人的原意。就這樣陸續整理出各章，到2005年基本完成。

在整理的過程中，也遇到多處記述不準確的地方。例如潘漢年晚九個月返回，毛澤東對他不滿。原文很強調密電碼的問題，我看到一些文章專門考證中共和共產國際恢復電報聯繫的過程，早在潘漢年返回延安前兩個月，延安在獲得大功率電臺後，用張浩帶回來的密電碼給莫斯科發出第一份電報，已和共產國際恢復電報聯繫。所以密電碼不是主因，而是毛澤東認為潘漢年和王明、博古關係密切，因而不信任他。

又例如：關於派陳雲、潘漢年去共產國際彙報，原手稿說陳雲和潘漢年是同時出發，其實已有文章指出陳雲是在6月份長征過了金沙江之後才出發的。又如六屆五中全會選出政治局委員12人，原稿寫成11人，缺王稼祥。類似這些

問題福銓都同意修改。文中寫到時間、地名、數字（長征中傷亡人數），很多是福銓研究其他資料得來的，是否準確，我們也無法一一訂正。他年紀已老，個別地方可能記不准，出現差錯也再所難免。除了我們發現的，文中很可能還有誤記之處，也希望讀者指正。

在《炎黃春秋》發表〈博古和潘漢年〉一章之後，聽到一些意見，我們又對直接引語用的標點符號「」做了修改。

本書主要回憶博古主政時的往事，基本按時間順序安排各章。

此外原稿還有很多涉及毛澤東的故事。對毛澤東的豐功偉業及他的雄才大略黨史早已肯定，但黨史把毛澤東描述成絕對正確、從未失敗的「神」，只寫他「過關斬將」不寫他「走麥城」，有時又把毛澤東做的事，記到別人頭上，不符合歷史真實。延安整風後知情人都不敢公開講，而這也是福銓聽來的故事中涉及較多的。在初稿中這些內容比較分散，我們整理出幾章，編為單獨一篇。但考慮到這些內容或者和博古主政無關，或者已有很多書籍記述，為突出博古主線，此次出版沒有採用。這裡僅列出各章題目：

這幾章是：

第一章〈湘南農民起義軍〉。講述井崗山時期「八月失敗」的前因後果。

第二章〈井岡山第三次反「會剿」〉。

第三章〈肅反擴大化——富田事變〉。肅反擴大，「殘酷鬥爭，無情打擊」歷來扣在李立三路線和王明、博古路線，其實毛澤東才是「始作俑者」。<sup>①</sup>

每章的引言是我和福銓討論，由我執筆寫的，表達我們

---

<sup>①</sup> 關於富田事變，可參看高華著：《紅太陽是怎樣昇起的——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》，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；高華：〈「肅AB團」事件的歷史考察〉，原載《二十一世紀》，1999年8月號。

的一些看法。當初考慮在國內出版，儘量少寫。這些表述並不是對事件和人物全面深入的分析，僅希望起到拋磚引玉或指引文章重點的作用。這次在香港出版，本想做些補充，但福銓已去世，還是保持原貌為好。

〈博古在中央蘇區〉一章還有兩節未整理完成，無法補入了。這裡僅介紹一下兩節的要點：

一節是土地問題及查田運動。黨史為了樹立唯一正確的毛澤東路線，在各方面都按「路線」劃線，一方絕對正確，另一方完全錯誤。在土地政策上為誇大與「左傾教條路線」的對立分歧，忽視雙方在土地革命大方向的一致性，用簡化的「地主不分田，富農分壞田」對「抽多補少，抽肥補瘦」代替對土改政策複雜性的分析。忽視毛澤東的土改政策也是不斷變化、不斷調整的，並不是一貫正確。查田運動出現的過火行為有其複雜的原因，本應客觀地分析，然而黨史將其簡單歸結為博古「左傾」中央的錯誤，而直接負責運動的毛澤東卻是永遠正確。這樣的以人劃線的總結並不能實事求是，無法避免以後各革命時期（抗日、解放戰爭、解放後）在毛澤東領導下的歷次土改中仍然多次出現過火行為。

另一節是與共產國際的關係。對於共產國際的指示、指令，博古一般是遵照執行的，甚至自己不同意也執行了（例如處理福建事變），這被認為是教條主義。毛澤東對待共產國際的態度是有利的就用，就執行，不利的就拖延、迴避，確實是比博古更高明。然而人們忽視一個客觀條件：即1935年季米特洛夫主持共產國際前後的差別。「七大前的國際是集中的組織，決議指示是必須執行的」。共產國際將各國共產黨視為直接領導下的支部，有權直接干預，所以才有米夫操縱六屆四中全會，毛澤東拒不執行共產國際的指令，導致他在寧都會議被趕下臺。季米特洛夫主張共產國際不直接領導各國，而是原則指導。沒有這個客觀條件，毛澤東的「靈活」辦法也很難行得通。教條主義的產生原因是很複雜

的，並不像毛澤東所說的「言必稱希臘」、「只知照搬外國經驗」那麼簡單，否則我們也不會在批判了左傾教條主義之後，很快又掉進另一個對毛澤東的教條主義，「一句頂一萬句」、「句句是真理」。

這次出版，增加了幾個附錄，方便讀者瞭解博古、劉群先、張越霞、楊琳、嚴樸、潘漢年。

我曾多次對福銓講：一定要盡可能說明「故事」的來源。或許因此，在他病故前幾個月，他寫出〈秦福銓自傳〉，可惜我當時在美國，回來他已不在世。他兒女交給我一份遺稿，我將其中和故事來源有關的內容抽出，也收入附錄。

《往事記憶》是福銓一直採用的書名，這個名字過於籠統。此次出版，我們將書名改為《博古和毛澤東——及中華蘇維埃的領袖們》。這本書以博古為主線展開，但主要寫土地革命戰爭（蘇維埃運動）時期的事情，也涉及毛澤東、周恩來、張聞天、項英、張國燾、朱德等在蘇維埃運動時期的活動。

我之所以願意幫福銓整理文稿，重要的一點是覺得他寫的東西可信。這幾年和他一起工作，接觸多了，也有了感情。我很佩服他，他是個對待史料極認真、嚴肅的人。他的記憶力很強，每次見面都滔滔不絕地講很多，而且他的確知道很多事情。2004年《中華兒女》雜誌第二期，發表了一篇文章〈華潤的紅色老闆楊琳之謎〉，就是由秦福銓口述（周燕執筆）。華潤現在的領導對他提供的史料評價說：「把華潤的歷史提早了十年」，在此前，華潤公司員工對公司1948年前的歷史知之甚少。

還有一件事，我也印象深刻。福銓在他的「自傳」中提到：張聞天在遵義會議上被選上總書記，但周恩來不承認，結果選舉作廢。關於這句話的來歷我想在此補充一個細節：2007年6月一天，我和吉瑪去福銓家談修改稿子的事，福

銓忽然對我說：「遵義會議第三天，會議上曾有過選舉張聞天為總書記的事，我一直沒寫過」。我問他是怎麼回事？他說：「遵義會議開到最後，張聞天提出博古不適合再當總書記，應該改選。一些人提出選張聞天，而且毛澤東也同意。要表決時，周恩來堅決反對，認為這個會議改選總書記不合適，甚至提出非要選舉，他就退出會議。由於周舉足輕重的地位，毛澤東也放棄了原來的意見，建議以後再說。最後會議統一認識，改選這件事保密，不要對外再提。所以會後仍由博古主持政治局常委會」。我聽福銓這麼講，就問他：「從來沒聽過這種說法，都說是一個月後到『鷄鳴三省』才交權的，你為什麼以前一直沒有寫呢？」他說是最近整理筆記才發現的，是聽嚴樸講的，肯定有這事。我當時有點半信半疑，曾勸他別提這事了。福銓沒有再提，也沒有要求我加到文稿中去。

2008年4月我們從美國回來，才知道他已病故。在他寫的自傳上，我又看到了上面那句話。對此我只能這樣理解：福銓是堅信自己記錄的事實的，他知道自己不久於人世，不願意讓他知道的「歷史故事」永遠被帶走，他要負責任地讓它傳下去。常言道，「人之將逝，其言也善」，我相信福銓是一個忠實於真實的人，他痛恨那些編造歷史、篡改歷史、信口胡編的行為。他盡力忠實地回憶、記錄他從長輩們聽來的「歷史故事」，只為了還歷史的真面目。

福銓在自傳和前言中多次使用了「故事」一詞，原因是潘漢年當年告訴他一個「小故事」，講述了周恩來和博古的一次重要談話。所以福銓在文章中，把他從長輩們直接聽來的統稱為「歷史故事」。這和一般人理解「故事」就是虛構的完全不同。這是真實的記述。當然，這些故事畢竟不是講述人當時的錄音或記錄，而是後來的回憶，難免有不準確的地方，所以福銓希望讀者將他的故事看作「一家之言」，不要誤解是經官方查證和確認的黨史。這也就是他說的「故事

就是故事」，「不要誤解為黨史」的意思。

這幾年，我們已經可以看到很多旁證，說明 1950 年代福銓聽來的很多故事是真實的。有關西路軍、富田事變、肅反擴大、湘南暴動的農軍，毛澤東假借張浩共產國際代表身份、長征中的兩頂轎子等等事實，近年來在各種回憶、專題研究的書籍已多有披露。我相信，隨著我國檔案法的貫徹，幾十年前 1930~1937 年之間的共產國際文獻的解密，有關這段歷史的會議記錄、中央文件、共產國際的指示、報告的公開，福銓這本回憶中的很多「故事」細節都將會得到印證。

近年來，對中共歷史上的重要人物，如陳獨秀、瞿秋白、李立三等都有重新評價。隨著博古傳、博古文集的出版，及博古百週年活動的舉行，人們對博古的功過評價也開始重新認識。但由於博古有近四年的時間曾是中共最高領導，又有黨的歷史決議將其定性為犯左傾教條主義錯誤，把他說的一無是處。因此對博古的評價較為困難，它涉及到對共產國際功過的全面評價，以及對毛澤東、周恩來在一些歷史問題上的評價，還涉及到對中共歷史決議的再認識，所以對博古的研究遠未深入，很多還有待更多歷史真相的揭示。

土地革命時期（1927~1937 年）是中共歷史上豐富多彩的「春秋」時期，加之「正史」對這一段有不少「誤記」，確實大有研究的必要。我們期望那些對此有興趣的，客觀的，嚴肅的歷史工作者有更多研究成果問世。

本書主要章節在 2005 年已完成，我們想爭取在國內出版。聯繫一些雜誌社，多數單位都因文章內容太敏感而回絕。只有《炎黃春秋》的編輯很支持，挑了不太敏感的一章，並做了刪節以〈博古和潘漢年關係的背後〉為題發表在 2006 年 10 月份的雜誌上。不料文章刊出後，遭到某些人的指責，說潘漢年是王明、博古的聯絡員，這是「宗派主義」的表現，是對潘的污蔑。更有人發表長文專門質疑福銓的文



章。致使《炎黃春秋》中止了繼續刊出（為紀念2007年博古百週年，本來想連載的）。因此，在國內是沒有人敢出了，在得到福銓的子女同意後我們決定到香港出版。

《往事記憶》是大堂哥福銓幾十年的心血，把長輩們講的故事保存下來，留傳下去是他一生的心願，更是他去世前幾個月念念不忘的事情。現在他的書出版了，實現了他的遺願，也可告慰他的在天之靈。在福銓生病住院彌留之際，非常遺憾沒有機會和他告別，在此也表達我們對福銓大堂哥的懷念之意。

2007年6月24日是秦邦憲（博古）的百年誕辰，2008年6月26日是秦邦禮（楊琳）的百年誕辰。出版此書以示紀念。

這次在香港出版，得到中央黨史研究室的李海文女士，香港中文大學大學服務中心的熊景明女士，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高華先生，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紀坡民先生的幫助，我在此代表作者的家人向他們表達衷心的感謝。

李海淵

2009年2月